

为巴萨夺“欧冠”拍案叫好

茅鹏

(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, 江苏 南京 210014)

实时断语

2011 年 5 月 28 日巴萨胜曼联捧走欧洲联赛冠军杯。美联社温布利报道中提出两个断语: 第一, 巴塞罗那足球队是“最伟大的球队之一”; 第二, 梅西是“与贝利和马拉多纳同样伟大的球员”。其制胜法宝是“控球”, “巴萨在温布利球场上的传球速度越来越快, 由梅西、伊涅斯塔和哈维组成的巴萨超级三人组合全场共完成了 305 次传球, 比曼联全队的传球数还多 4 次”。“小个子梅西”, “已铁定会连续第三次荣获年度世界足球先生的称号。”(见《参考消息》2011 年 5 月 30 日第 9 版)我为巴萨、梅西, 拍案叫好!

谁与比肩

梅西使我想起两个人: “功夫”誉满全球的李小龙和 20 多岁时就荣获世界最高级数学奖项的澳籍华裔数学家陶轩哲。

他们有共同的特点: 从小沉浸于专项; 全身心地从高级的专项生活中穿越自身的童少年史; 青年期就登上专项巅峰。他们的生命史, 一条龙式地与专项相结合。

能力何来

汽车等机械, 是人们(“他者”)制造的, 是“他组织”产品, 其功能水平取决于制造者。它不能在应对中自动调整自身结构, 必须经人们重新设计、改造后方可得到调整。

生物体是“自组织”的, 属于复杂适应系统。高级动物具有以神经和基因为核心的“实体信息系统”调控身体的发育成长, 在应对经历中会自动调整自身结构而提高能力。“能力”不仅靠先天, 更靠后天“训练”。只有历经包括残酷格斗史在内“训练”出来的雄狮, 方可统领和维护一支强大的狮群; 动物园里养大的狮子, 若径直放归原野, 连存活能力都欠缺。

人体更是已知宇宙中最高级的复杂适应系统。关键在于具有以“大脑皮层(新脑)—DNA”为核心的信

息系统调控身心的发育成长。能力水平与训练史密切相关。梅西与李小龙的专项能力, 都是从小在高级的“专项格斗系列”中训练出来的。(不仅“专项化”, 而且较充分地利用了童少年期。人一生中训练最敏感、最可塑、最优质的、不可替代的一个“时期”)

机体对“能力”, 是“整体自洽”(整体设置)的。因此, “非专项”能力(“杂项化”能力)的发展, 非但不能提升专项能力, 还会“挤”低专项能力的可能高度。在田径史上, 十项全能运动员不能在其任一单项上创造出世界纪录, 就是例证。这既是体育训练的共性, 也反映了专项训练的特殊性。(共性与个性(特殊性), 是同一事物秉性在不同领域里的反映)运动能力的发展, 有赖于更好的“专项化”训练。

所以, 运动员的成功, 不仅要有天赋, 更需要合格的训练和管理。好天赋, 还须谨防被错误的训练管理所折腾、糟蹋。

近百年来, 中国足球何以从东亚魁首降至亚洲二、三流

足球与功夫、数学等等类似: 不光适合于其他人种, 同样十分适合于中国人种。那么, 近百年来, 在日、韩足球逐渐趋近于世界水平的形势下, 中国足球为何反而从东亚魁首, 降至亚洲二、三流呢? 很清楚, 就是由于中国足协抓训练不对头。例如: “体能测试标准”、“身材要选一米八以上”、主抓呆板的“基本功”而不主抓活生生的“竞赛性足球球艺”、抓赛龄运动员而不抓儿童青少年、重视金钱而无视科学逻辑……如此随意“拍脑袋”决策违反客观规律, 几十年坚持不改, 中国足球焉能不衰败! 比尔·盖茨说: “我犯过许多错误, 但是我会从错误中学习。”(《凤凰周刊》2011 年第 20 期 27 页)认识到训练不对头, 足协才会开始进步。

不讲逻辑

中国足协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搞所谓的“足球

改革”，有几项重大举措。例如：投钱、引进外籍球员……

中国足协引进外籍球员，主要是秉持“替代型发展”的思想路线，貌似为了提高足球水平，实际着眼于卖票生钱。足球专家特鲁西埃认为，这样做，核心位置被外籍球员据占，中国球员反被边缘化，水平提高不起来。他认为，应该坚决培养中国自己的运动员。这就是“内生型发展”的思想路线。(不是不能引进外籍球员，问题是放在什么地位上，用什么样的思想路线来认识和主导，怎样操作)

足球训练主要抓“基本功”，这是“替代型发展”思想路线在训练领域的反映；足球训练主要抓“竞赛性足球球艺”，这是“内生型发展”思想路线在训练领域的反映。“控球”是足球运动中的一项关键性技术。在动态的“阵式相位”中，特别是在瞬间的“辨识应对”中，它与“敏捷和隐蔽”的传接球技术相结合，与相关的“跑位”相结合，是能否抓住间不容发之机会，是球队能否取得活力的关键。这是球队由“死”(机械性、呆板性)变“活”(灵活应对巧妙性)的关键。结合其它技术，便共同产生出球队争胜、制胜的力量。使球队在场上由11个“散在的”个人变成为“具有内在生命力的有机整体”，变成为一个面对着对手的“复杂适应系统”。身材矮小的日本队获2011年女足世界杯冠军，德国《时代》周报2011年7月14日文章说：短传多、转换快、控球早，日本女足是“染指甲的巴萨”，说明这两队球风均以控、传、整体性和生命力活跃见长。(见《参考消息》2011年7月17日第6版)然而，包括控球、传接，特别是面对场上现实形势的“辨识应对”、跑位、……这些丰富、生动环节在内的“球艺”，却常常被排除在“基本功”之外。(而且，大多数“球艺”本身，也很难离开“竞赛性游戏”的动态格局、而“独立-替代”式地存在。也就是说，一般很难满足“基本功”的格式)因此，“球艺”，不能指望主要由“基本功”训练出来，而特别需要在大量的、生动的“竞赛性足球游戏”(主要就是“足球赛”本身)中，“内生性”地训练发展、丰富起来。主要抓“竞赛性足球球艺”，不是不要“基本功”，而是要练得对、练得好、练得活。像多部位接球技术等等，要努力学好；像贝克汉姆那一脚远射(传)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以上这些“主、次、面、点”问题，应该成为教学资源、教学艺术、教学思考、教学安排等等环节中着重需要关注的内容。教练员的成长，也是与这些因素分不开的。

如果讲逻辑，那么，对这两种“思想路线”，就必须展开探讨。但中国足协什么时候曾经研究过，更不

必谈号召大规模地开展研究了。这说明，中国足球是率性任意“拍脑袋”做决定，不讲逻辑。不讲逻辑，脑筋里还会有“科学发展观”吗？体育和训练，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。它既鲜明具体地呈现着(似乎非常浅近)；而其内涵，却需要极其深刻、复杂、科学的理性思维，才能逐渐寻求穿透。

二元训练理论与一元训练理论

1955年我到“国家体委第一届在职干部训练班”学习前苏联体育理论。知道了体育训练有两大“元因素”(两大本原部分)：体能、技术。

体能：包括力量素质、速度素质、耐力素质、灵敏素质等庞大的体系。举重等项训练发展力量素质，短跑等项训练发展速度素质，长跑等项训练发展耐力素质，体操等项训练发展灵敏素质……这样，就构成了“全面身体素质训练”体系。认为这是一切体育项目进行训练的共同基础，认为这是体育训练的共性。

技术：在上述基础上，在专项训练中发展。认为这是体育训练中的个性。

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，而非存在于个性之外。它这里把“杂项化体能”当作“共性”，把“专项”当作“个性”，把完全错开的两个方面“拉郎配”，这在认识上是完全错误的。

训练安排全年分为4个时期：准备时期进行全面身体素质训练，基本时期由全面身体素质训练向专项训练过渡，比赛时期主要抓专项，过渡时期则降低强度再返回全面身体素质训练。“身体训练”(体能训练)与“技术训练”(专项训练)各居半数，填满全部训练空间。

对儿童少年而言，要“反对早期专门化”(反对“专项从儿童抓起”)，坚决搞“全面身体素质训练”，藉以打好一辈子的基础。

这种理论，由“体能”、“技术”两大“元因素”着手建立。因而，我称之为“二元训练理论”。究其实：它所谓的“体能”，就是专项之外的“杂项”；“二元训练”，实际就是“杂项化训练”。

回省后我坚决贯彻。实践中发现：举重运动员不能做“吊环十字”，力量素质何在呢？短跑速度与运球速度不相连通，速度素质何在呢？马拉松运动员跑百米过50m后显著减速，耐力素质何在呢？体操运动员跳马助跑的不美姿势很难改进，灵敏素质何在呢？

1958年秋集训千余名大中学生迎接首届全运会，时间紧迫乃跳过“全面身体素质训练”阶段，直接练专项，然而，进步很快。袁伟民、邹治华、韩永年、孔祥鼎等等都成长为国家队队员；“专项化训练”何妨

呢？通过丁小平事例还发现，早练专项并非就使运动员陷入不能运动长寿，反而有利于运动长寿。

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。面对实践，我经过大量的多学科自学和痛苦的思考，领悟出：“力量素质”等等庞大的体系，在身体中，客观上是不存在的。这是“有关专家”为力量、速度等项“运动属性”凭空发明出来的“功能载体”，完全是“主观臆想”。

无中生有地“发明”（捏造）出了这些“功能载体”之后，就可偷换概念，将力量、速度等项“属性存在”，转变成为“结构存在”了。（力量、速度、耐力……本来都是“运动能力”这一“整体”的属性（都是“整体”）；经过这个“素质化”转换，就都“变”成了“结构体”，“变”成为“运动能力”这一“整体”的“部分”了）于是，凭空、捏造的“功能载体体系”，同“专项”相并立，构成了他们所设计的运动训练“总体”。就这样，根本性地建构成他们的训练理论。于是，就在训练学的历史上，人为地建立起体能、专项“二元观”，陷入了“杂项化训练”的陷阱。

我发现：“体能”与“技术”，是同一本质的不同侧面。“元因素”只有一个，并非两个。力量、速度等项运动属性，非藉“功能载体”而分别独立存在，均由机体的整体“一体化”决定，并且随着机体整体结构在训练应对中的自动调整而发展。（不仅调整相关肌体的发达状态、相互配置关系，而且一直调整到上至大脑皮层中的“预案储备”库，下至例如肌纤维成分、线粒体发展等等全方位的、亿万“微组织”，针对性地形成了高度协调和谐的“有机整体”，这就是“运动能力”，这就是“元因素”，这就是“一元化”统一，这就是“复杂适应系统”，这就是“熵减少”，这也就是人体在进化史上特别高级之所在）我并不反对练体能，但揭穿了假冒“功能载体”的“身体素质体系”，反对“杂项化训练”，主张“专项化训练”。

1960年5月调我主持南京体育学院体操班。在同志们支持下搞训练改革：取消“全面身体素质训练”，搞“专项化训练”，当年10月，夺得全国体操男女团体双冠军；又着手从儿童开始练体操，实现“运动训练全周期”的“专项化”，以至20世纪70年代初国家男子体操代表队8人中6人来自江苏。（由于对手尚束缚在前苏联体育理论的错误框架中，而我们已开始突破，对比成绩就非常鲜明了。在当前体坛，各项目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的机会、机制和格局，对此给予正确和敏锐的认知，是非常重要的）这些做法，均与我所学的前苏联体育理论相反，沿此思路走下去，就发展出了成体系的“一元训练理论”。

1964年我应邀发表《身体素质论应当否定》一文，

立即遭到一报一刊（《体育报》、《新体育》）展开全国性大批判。我随即被斗争、免职。然而，“专项化”和“从儿童抓起”训练改革，却由于国家体操队的重视而在全国体操界流行开来，并传入“紧邻的”跳水、蹦床等项目。在这些准高含金量项目上，中国遂先于国际训练平台，并夺得北京奥运会这几项24块金牌中的18块，捍卫了国家和民族的荣誉。我虽然身遭两度免职，内心却涌出了幸福感！

中国举重，由于访保加利亚取经后进行“专项化”训练改革，取得优势，包括夺得北京奥运会该项15块金牌中的8块。可见，项目不分技巧型、体力型，“专项化”训练规律，是共同的。对比田、游、三大球，北京奥运会仅获85块金牌中的1块。搞不搞训练改革的结果对比是如此的鲜明。（刘子歌的这一块金牌，实际上还是训练改革的成果）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。

现在有崇奉领导思路的专家透出意思说：“二元训练理论”和“一元训练理论”并不成立。另有好心者传言给我：不要再向领导寄呈作品，给领导添乱了。

我与友人合作撰写的《一元训练理论》，在《体育与科学》2003年第4期全文发表，又在德国体育联合会的《竞技体育》杂志2011年第1期全文发表。它在我体操等多项目多年训练的实践检验中取得成功，并且被国际体坛半个世纪以来训练实践进化运动的发展走势所印证。实践检验证明它是促进训练改革的理论，对它判决“不成立”，学术研究允许这样做吗？这对国家有利吗？（自《身体素质论应当否定》遭大批判以来，国家级体育层面从来就没有对此改正过。这种“不成立”待遇，一直延续迄今，事实上阻抑训练改革，严重损害着国家的体育利益）

前苏联训练理论曾经在全世界流行。但在实践界，除了中国足协等少数“硬扛者”外，在全世界已很难完整得见。它虽然在“实践进化”冲击下，已是“靠边欲坠”的训练理论了，但在理论界，其“主流理论”面具尚未揭去。它在国际体坛虽日益衰败，在中国却仍高踞显位，严重阻碍体育发展。为了从根本上点明其本质，彰显它与“一元训练理论”的对立，究其实称之为“二元训练理论”，怎么会“不成立”？（就像辛亥革命并不自称为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”，社会科学家就其本质给它这个名称，怎么会“不成立”？）

从中国的体操等项目，看到了由理论创新引导实践跃进的成功范例。从国际体坛的训练实践进化运动，看到了由“杂项化”趋向“专项化”的发展洪流。如此普盖中外的、鲜明和广泛的事实，检验着对立中的哪项训练理论，真正反映客观规律。这对于体育领导，

尤其重要。然而认识落后于实际,存在种种不同认识,是完全正常的。“力量素质”等“功能载体”,是否臆造?“体能”、“技术”,是“二元”,还是“一元”?这关系到体育训练发展的根本方向。这也是半个世纪以来国内、国际体育发展史中的根本性重大内容。认识不清,可以讨论,就此展开讨论,既迫切、又重要。所谓的“不成立说”,试图蒙起双眼,不看事实,抹煞对立,取消讨论,这是十分有害的。

有训练学专家说:“运动能力”与“体能”、“技术”的关系,是“整体”与“部分”的关系。(这样就坐实了“二元”)认为所有训练理论,都必须由此出发。这说法能成立吗?

性别、年龄、身高、体重等项对于“体检者”来说,都是从不同的认识范畴反映着同一整体。它们均属“整体”,均非“部分”。相互间不可通约,互不统属,构不成“整体”与“部分”的关系。同理:“体能”是从动力学范畴观察“运动能力”,“技术”是从运动学范畴观察“运动能力”,两者均属“整体”,均非“部分”。说“体能”、“技术”与“运动能力”,构成“部分”与“整体”的关系,混淆了认识范畴,完全是个“伪命题”。不讲逻辑,就会在学术上闹出笑话。

然而,中国足协却坚决认同上述说法,把“体能”、“技术”当作“足球能力”的两个“部分”,大力训练“发展”。(不但如此,更把“体能”看作根本性的“部分”,而把“技术”看作派生性的“部分”,追求所谓的“体力足球”)束缚教练,坑害运动员,搞糟中国足球几十年!

如前所述,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体育训练实践和理论,经历着截然相反、针锋相对的分化和改革运动,当前仍在继续。这在中国体坛,尤为激烈和诡谲。而中国足协却如同鸵鸟般沉迷在陈旧理论的草堆中:坚持“二元训练理论”,拒绝“一元训练理论”,与国际发展走势背道而驰,差距越拉越大。迄今不悟,实在可悲。

前苏联体育成绩从何而来

有专家质问:既然你说前苏联训练理论存在根本性错误,那么,前苏联体育成绩从何而来?

前苏联体育成绩来自于运动员和教练员们的努力。由于人体是已知宇宙史上最高级的“复杂适应系统”,有“大脑皮层——DNA 实体信息系统”核心,可适应性地调控机体应对环境,所以,任何训练方法,不管正确错误,只要不伤害身体,都有助于提高运动能力。(只是效率和效果各不相同;正确、错误即对此而言。由于人体的先进性(特别是大脑皮层的先进性),

即使是“反面教育”,也可从中获取“进步”;然而,不能因此就纵容“反面教育”。不同水平的教育(更不谈正反性质的教育),其效率和效果是大不相同的)。

以“二元训练理论”为例:它讲“二元”是错误的;它搞“训练”却是正确的。于是,既非不能提高成绩,又必然会在实践检验中不断修正;甚至从“量变”过渡到“质变”。最主要的发展趋势,就是从“杂项化”过渡向“专项化”。若从先进事实来观察训练,可以看到:中国女排全年主要就是球,王军霞全年就是跑,朱建华全年进行“专项化训练”……(虽然中国体育行政对“二元训练理论”坚持不变,卓越的教练员却“下有对策”地自主改革着了。(中国女排是由于周总理指示学日本的大松博文,从而进入“全年专项化”的))“杂项”不仅在“量”上受到极大的压缩,在“质”上也“潜移默化”地变身向“专项化”了。在国际体坛,由于没有行政阻挠,这种演化,更加普遍和明显。这就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训练实践发展史。

在训练管理上,包容不同方法,有利于创新方法萌芽和落后方法的淘汰。在国际体坛上,包括前苏联体坛在内,都是具有包容性的。他们的理论界和实践界是分离的,理论对于实践并无行政约束力。它们实行教练员负责制,(不是“下有对策”,而是公开明确地赋予“独立自主”)这就在训练实践中出现了“进化运动”。他们的理论界虽然没有萌生出“一元训练理论”,但他们的实践界,却越来越向着“专项化”发展,越来越趋近于“一元训练理论”所主张的做法。(实践超越陈旧理论)像中国足协这样死守陈旧理论,拒斥“包容性”,扼杀训练实践进化运动,(陈旧理论掐死实践)在国际上是罕见的。

体育竞赛是互动的,历史是演化的。在前苏联理论主导前苏联体坛的同时,全世界体坛也通通奉前苏联理论为主导;彼此的认识和行为相似,在这样的背景下,前苏联比出成绩并不奇怪。然而由于理论影响的力度不同,在训练发展史上还是可以看到痕迹的。前苏联由于“举国体制”在“投入”上的巨大优势,得以掩盖训练方法上的滞后,然而,仍在许多地方流露出不良后果:例如,前苏联足球从来就达不到世界一流,直到俄罗斯请希丁克来帮助改变面貌;又如,前苏联举重曾经称霸世界举坛,20世纪70年代初被保加利亚搞“专项化训练改革”一举超越,就再没有翻过身来。还可以看到前苏联田径训练中的不平衡性和分化性,甚至“专项化”和“从儿童抓起”也萌芽发展出来了:邦达尔丘克就是出名的“专项化训练”改革家,使前苏联链球称霸世界;布勃卡10来岁就被彼得罗夫选去练撑杆跳了。这些,都已经是与传统的

前苏联理论“对着干”了。

早年巴西足球，曾经有过“体能测试标准”，后来很快就废除了。现在国际上足球比赛覆盖全年，哪能容得下半踞天下的“体能训练”？可以看到：克林斯曼的德国队，虽聘请了美国体能教练，训练比重却很小，内容也大大地“专项化”了。张斌报道说：“穆帅从不练体能。”（张斌：《那个叫穆里尼奥的大明星》，载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10年第32期144页）时移世易，见仁见智，关键在于发展。可是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中国足协的僵化，就十分突出了。

体育行政不在“森严壁垒”，贵在搞好服务型管理

中国足球不行，并非中国人不行，实在是中国足协不行。中国足协不讲学术，刚愎自用，壁垒森严。无视足球的发展趋势，顾固主张3点：苦练体能（杂项化体能），“三从一大”（脱离比赛强度），抓大放小（抓赛龄运动员、放弃从儿童练起、搞无源之水）。这3点全错了，足球怎么可能不越来越落后呢？

李娜法网夺冠，创造历史。这首先就是中国网管中心管理改革的成果！赋予李娜“单飞”，自聘教练、自主训练、自由参赛，不受行政约束，使李娜得以展翅翱翔。这个宝贵经验，很值得中国足协学习。

若要中国足球起飞，中国足协管理必须改革。管理改革，首先要管好中国足协自己：第一，清除“黑字号”的“腐才”；第二，消减“官僚化”的“庸才”；第三，起用全心全意贯彻科学发展观的“人才”。

贯彻科学发展观，就是要面对事实（包括史实），要调研、要学习、要分析、要联系群众、要问责、要不断创新：

(1)集中精力搞好管理，在训练方法上决不当“婆婆”。

立即废除“苦练体能、三从一大、抓大放小”3点僵化的训练方针，解放训练业务。

训练业务坚决贯彻“双百方针”，包括该搞“杂项化训练”，还是该搞“专项化训练”等等训练业务问题，由教练员、科研人员和广大关爱者们去自由研究、比试。对于任何一支具体的足球队来说，均交由身负责任的教练员作主，行政不予干预。

训练工作异常复杂。例如，“三从一大”作为“能力训练”方针，导致脱离比赛强度，是不正确的。但是，训练的某些形式，并非不可采用“大数量”和“长时间”。例如，穆里尼奥对于C.罗纳尔多“一天训练5个小时”曾大加赞赏。但并非“练体能”。当细抠“动作技术”（进行塑造或改进、改革）时，不妨“慢工出

细活”。例如，玛塔“一对一过人”动作的精致，胜似高级舞蹈；这是从小的“竞赛性足球游戏”中“内生性”地形成的，也可由“技术教学”帮助作进一步加工雕琢。在艺术家的艺术生活中可以常常看到这种“雕琢”。这种“慢工出细活”，可以采用“大数量”和“长时间”。（强度一般控制在“中等”以下；如果涉及到较高强度，则又必须联系“体力波”规律，对“训练课”或“训练日”等等的“整体性”环节，给予适当的掌控、调整）由于训练工作高度的复杂性，所以，应该高度尊重教练员的全权掌握，赋予高度的责任心和灵活性，让他结合自己的学习思考，在“独立自主”工作过程的经验教训中，不断成长、丰富。行政不应干预。

行政不予干预并非不予重视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，在教育、支持、包容以及竞争、鉴别中促进教练活力，而非用强制性“大纲”框死教练活力。选拔和培养强大的教练员队伍，这是争取中国足球崛起的一个主轴性的、引导性的艰苦任务。同时，在大型体科所和体育院校中，应该培养足球训练史（包括重点队、重点运动员确凿可靠的具体训练史）专家，建立研究组、教研组，出版系列专著，使史实研究、理论与足球实践的掌控，立体配合，把足球学术切实地、能动地发展起来。这对中国足球建设，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。

(2)坚持教练员负责制。

将训练全权赋予教练员，然后定期对实践成绩进行考核。评价教练员，只凭实绩。不能以是否“听话”、是否执行足协规定的训练方针，作为评判标准。这样，是非明确，教练业务就会不断进步，训练方法就会不断进化。

(3)着力抓基层。

法国勃良第只有3.5万居民的小镇有支欧塞尔足球队，1961年起步，1996年荣获法国甲级联赛和足协杯“双冠王”。40年坚持在该队执教的鲁克斯，以绝对优势被评为法国最佳教练员。这是竞技、全民健身、社区建设相统一的大亮点。深刻地表明了体育对社会建设的意义，足球对“社会基地”的依存关系，水平对“坚持史”（包括良性代际交替）的依存关系。这种关系，并非是由投资大小等类措施所简单地决定的。

“欧塞尔队”和“鲁克斯”的水平，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；其风范，却是有心人都能做到的。我们并不一定要达到它的水平，但绝对需要它的风范，以便从根基上夯实中国足球的基础。中国为什么不能有十支、百支“欧塞尔队”，十位、百位“鲁克斯”？就是由于中国足协不想去做，不想通过“艰苦努力”去

做。

“鲁克斯们”主要是“为她人作嫁衣”，然而，却需要热情地、耐心地、不断地钻研和从事足球启蒙，需要大量从事发现、劝诱对象的“群众工作”；需要面对不是太好，甚至是简陋的客观条件；需要面对不高，甚至是较低的薪资报酬；需要面对困难清苦的生活；需要面对不断遭遇的大小挫折……当前现实的足球界，不太可能有很多人愿意积极主动参与。因此，除了对足球界进行动员，并以有秩序的“志愿者”条件进行招募以外，需要面对社会从事招聘和培养工作。例如，从现职的小学教师中(包括从免学费师范生中)发现“志愿者”(高度重视其精神品质和认知能力上的优点)，再进行足球业务的启发培养等等。本身是否曾经是足球运动员，并非必要条件。(由于足球技术会在竞赛性足球运动中内生性自然成长，只要“鲁克斯”把儿童球队组织起来，坚持经常训练和经常参加比赛，年复一年，优秀的儿童苗子，就会自然地、渐渐地涌现出来。“鲁克斯们”的业务也会不断提高)很重要的是，中国足协主动给他们“注册、挂号”，长期保持着联系(在电脑“名录”中不断加注新鲜事迹)，使他们在精神上有所依靠，碰到问题有申述、求解的“家”。中国足协应自下而上热情地发现、促进“鲁克斯”，而不是用“大纲”等自上而下地卡抑“鲁克斯”。这一切，中国足协只要有决心，是可以不断开辟的。大量的、持续的、虔诚的、小学阶段的“欧塞尔队”，是中国足球崛起的、无可替代的伟大基础。再加合理的后继成长工作，中国足球就会水涨船高、蓬勃发展起来。若讲留学，只有钱三强、何泽慧、李政道、杨振宁等等具有苦学基础和钻研学术渴望的年轻人，去欧美留学，才能达成世界一流的杰出成就。没有基础和渴望的人，即使拔苗助长地派去欧美留学，也很难想象会一步登天，达成世界一流的杰出成就。有在国外生活多年的人甚至不会讲外语，就能说明这个问题。

(4)大力开展群众性儿童少年足球运动。

乌拉圭足球 10 岁儿童就有联赛。(见《体坛周报》2011 年 8 月 1 日 A18 版程征的《足球要从小抓起 教练更要从小抓起》)这是中国立即需要学习、引进的先进制度，既符合全民健身，更符合足球建设的需要。即使不能在全国开展，完全可以在重点县市首先开展。(足协并派驻强有力的工作组进行制度创建)这是一个“敏锐改革”，还是“颞颥陈腐”临界的问题！

欧洲某俱乐部发现某 6 岁小孩擅长“踢球进箱”，竟通过球探结为“签约球星”。(见《参考消息》2011 年 4 月 30 日第 6 版)可见他们是备有“清单”的。中国足协手上，能否掌握百支、千支“儿童足球队”，千

名、万名“儿童足球运动员”的“清单”，并掌握其逐年、逐季的“赛况”，演进出源远流长的中国的“足球家谱”呢？

(5)端正领导和群众的关系，海纳百川。

据报道，中国足球管理中心韦迪主任巡访新疆时说：“中国足球不缺身体，不缺技术，缺的是文化。”

“韦迪认为，其他单项可能发现个别有天分的孩子，就会培养出世界冠军、奥运冠军；但像足球这样的集体项目，如果智慧不够、文化积累不足，很难想象在瞬息万变的足球场上审时度势，不断作出判断、选择和应变。‘文化素质低的球员只会在场上跑，而不知道怎么走’”。(见《报刊文摘》2011 年 5 月 18 日第 2 版)

面对巴萨、梅西，甚至韩日，中国足球“缺不缺技术”？这样重大的专业是非，这里暂且不说。其他单项，是否不必“智慧”、“文化”，就可以成就世界冠军，这里也暂且不谈。马拉多纳、梅西等人之所以成就为足坛巨星，作为主要原因或重要原因之一，是否就在于“文化积累”上超过了其他广大球员，这里也暂且不论。韦迪主任所说“足球运动员需要‘在瞬息万变的足球场上审时度势，不断作出判断、选择和应变’，有的球员‘只会在场上跑，而不知道怎么跑’”，就是足球界久已讨论的“球场意识”问题。

“球场意识”需要在复杂、激烈、隐蔽的情况下瞬间巧妙应对，间不容发。把它看作是“现场实时思考”后作出的“应对”决策，首先在“时间花费”上就通不过。这是对身心，主要是对大脑皮层的性质、功能和运作状况的一个误解。不谈“足球”，让我们来看看“智慧”、“文化”、“思维”的意义断然不低，而且在“反应时间”上又比足球大幅从宽的“棋类”吧，好学、留洋、身经百战的陈毅元帅，不过获得日本围棋方面“高看赠与”的“七段”称号；周总理认为，这项“赠与”，是友好的、真诚的。与之相似，可以看到：没有任何棋类世界冠军具有学界的博士学位；也没有任何科学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曾经获得过棋类世界冠军。从中便可以知道：棋艺(与“球场意识”地位相似)作为心智财富，与“文化积累”作为心智财富，是明显区别的。就像营养学家的研究，与名厨的智慧(包括火候等等在内的厨艺)，均可称为“心智财富”，其内容实质却完全是相区别的两回事。

对足球来说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：“球场意识”与“文化积累”具有相关性。却有无数证据证明：“球场意识”，依赖于“足球运动实践经验”，依赖于成队对抗中更复杂、激烈而又微妙的“应对经验”。换句话说，它高度地依赖于大脑皮层中相应“记忆块”(即包括“内部模式”在内的、浩繁而又精妙的、关于辨识应对的、

组织化的神经联系，之所构成的“预案储备”库)的成长和积累。有这样的根底，才能有球场上卓越的“判断、选择和应对”。优秀运动员、特别是领军的核心球员，在场上面对现实、对未来10~20s的演化和如何巧妙地“催化”(转化)，头脑中应该有清晰的“预见”和“策划”。这就涉及“预案储备库”的创造性“调用”问题。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主题，在拙著《为何难圆足球梦》中进行了探讨。(该书由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)

《为何难圆足球梦》是我自作多情，全力为中国足协撰写的，拼微薄微力，自费出版。每逢新任履任，必立即用特快专递寄呈。翘首北望，企盼获一青眼，以求助益于国家事业。岂料历届足协领导，未予任何一点点回应。作为中国足球事业的主管领导，如此对待痴情足球的群众，是否正常？

我不敢说自己有任何水平，但热心我国足球，且八旬而痴情不改。看人看事不能凭标签而不看本质，历届足协领导坚持对我的批判态度而对我不屑一顾，但我敢说自己对足球事业的忠心并不逊于足协高官。这本书固然有种种缺点和不足，但并非没有千虑之一得：它对“杂项化”与“专项化”分野之论述、对青少年足球球艺内生型发展路线的苦苦呼吁、对“球场意识”本质之阐明，历史恐将证明，均属确凿的科研发现。有司与平民，并非仙凡两界，不可沟通。孔子还主张“不耻下问”。胡鸿飞是伟大的教练员，我与他见得了面，谈得上话；毛德镇教练带队来南京，立即邀我商议；徐福生教练与我一见如故，送我足球训练录像带；周明教练与我促膝交谈；陈冠湖教练送我珍贵文章；梁田老教练与我保持多年联系……热衷体育者不可能冷漠训练探讨，中国足协如此冷漠训练探讨令我十分不解。在此我非敢自夸，只想凭忠于国家事业的拳拳之心，吁请足协海纳百川。

(6)尊重科学、尊重人才。

只有300万人口的乌拉圭足球，几十年保持着世界水平；亚洲多个国家足球，正在上升；独中国长期

趋降，非常显眼。从大面、大历史上看，足球并不神秘——得其常者达，得其精者杰出，违其常者跌落。在足球运动中，不仅有组织、规模、经济、赛场等等外在问题；还有“训练路子”这种内在生命力的问题。乌拉圭、科特迪瓦等等之所以能与德、英、法等发达国家在足球水平上拉近距离，就是由于其“训练路子”大体对头。足球水平并不以国家的大小、穷富为根据，而主要以“训练路子”为根据。几十年来，中国并非不努力，而是着实地大大“努力”了多少回。中国如此大手脚地施展作为，却只落得从东亚魁首向亚洲二、三流趋降。应该觉醒到，不光是其他方面有问题，关键是“训练路子”这个内在生命力问题。(把责任推给历史、推给群众、推给文化……都是没有根据的)

足球已经是世界性规模、世纪性历史的事业了。客观规律已经在事业的洪流中，生动而自在地发挥着作用了。承认不承认客观规律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只有不怕艰苦、潜心地搜求客观规律，才能指望攀登更高的高峰。这对于历史悠久、人才荟萃的中国来说，本来是具有优势的。任意抛撒优势，才导致一败再败。中国足协可以继续地无视客观规律，率性“拍脑袋”而为；但若这样做，继续碰壁的命运，同样是不可避免的。应该是“明昨非而求今是”的时候了：勇敢地面对事实，接受教训，承认规律，在训练上开启正确的征程。在这里，最迫切需要的，就是尊重科学、尊重人才的自觉。

南勇时的足协，涉黑串窝，重用的是“腐才”、“庸才”。必须一改痼疾，像从躬耕南阳的平民中搜寻诸葛亮那样，起用“人才”。例如，特鲁西埃对日本足球升腾有功，是被证明了的人才；深圳可以聘来任教练，中国足协何不就便讨教、咨询？如若竭诚求才，时刻访贤，朝夕不忘，总可以通过种种方式和途径，不断有所作为的。

抛砖引玉，欢迎批评指正！